



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第一辑
主编：杨镰

到青海去

顾执中 陆诒 / 著 董炳月 / 整理

Daoqinghaiqu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第一辑
主编：杨镰

到青海去

顾执中 陆诒 / 著 董炳月 / 整理

Daoqinghaiqu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到青海去/顾执中,陆诒著;董炳月整理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12.12
(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)

ISBN 978-7-5153-1252-1

I.①到… II.①顾…②陆…③董… III.①青海省—概况 IV.①K924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71247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57350511 门市部电话:(010)57350370

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675×975 1/16 23.25印张 2插页 265千字

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000册 定价:42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57350337

《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》

总 序

20世纪，是人类社会进展最快的世纪。20世纪的通行话语是“变革”。

就中国而言，自进入20世纪，1911年“辛亥革命”为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谱系画上了句号，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，新文化普及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，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。20世纪前50年间，袁世凯“称帝”、溥仪重返紫禁城，北伐、长征、抗日战争……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新中国受到举世关注。此后，特别是从“文化大革命”到改革开放，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感受，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。

20世纪是中国进入现代时期的关键的、不容忽视的转型期，以20世纪前半期为例，1900年，“八国联军”践踏中华文明，举国在抗议中反思；1901年，原来拒绝改良的清廷宣布执行新政；1906年，预备立宪……以世界背景而言，“十月革命”，两次“世界大战”，成立联合国……1911年到1949年，仅仅历时30多年，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，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巨大跨越。反思20世纪，政治取向曾被视为文明演进的门槛，“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”，不是红，就是黑，一度成为舆论导向，影响了大众思维。

无可否认，在现代社会，伴随社会的进步、发展，中华民族的民主、科学精神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，是中国历史最具影响力的事件，

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、中国现代时期的鲜明特点。

《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》则为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过程，提供了真实生动的佐证。

20世纪的丰富出版物中，一定程度上因为政治意图与具体事件脱节，人文地理著作长期以来未能受到充分关注，然而文学、历史、政治、文化、语言、民族、宗教、地理学、边疆学、地缘政治……等学科，普遍受到了人文地理读物的影响，它们是解读20世纪民主、科学思维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通用“教材”。

人文地理纪实无异于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进行的“国情调研”，进入20世纪的里程碑。没有这部分内容，20世纪前期——现代时期，会因缺失了细节，受到误解，直接导致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认识不足。

就学科进展而言，现代文学研究是最早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位置的学科之一，《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》则为现代文学家铺设了通向文学殿堂的台阶：论证了他们的代表性，以及他们引领时代风气的意义。

与中华文明史、中国文学史的漫长历程相比，从“辛亥革命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，30多年短如一瞬间，终结封建王朝世系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是现代时期定位的标志。

“人文地理”，是以人的活动为关注对象。风光物态、环境变迁、文物古迹、地缘政治……作为文明进步的背景，构建了“人文地理”的学术负载与阅读空间。

关于这个新课题，第一步是搜集并选择作品，经过校订整理重新出版。民国年间，中国的出版业从传统的木刻、手抄，进入石印、铅

印出版流程，出版物远比目前认为的（已知的）宽泛，《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》的编辑出版，为现代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参照，树立了传之久远的丰碑。否则，经过时间的淘汰，难免流散失传，甚至面目全非。

《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》与旅游文学、乡土志书、散文笔记、家谱实录等读物的区别在于：

人文地理纪实穿越了历史发展脉络，记录出人的思维活动，人的得失成败。比如边疆，从东北到西北，没有的人文地理纪实之中读不到的盲区。21世纪，开发西部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。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天，进入了现代时期便成为学术精英肩负的使命：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前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，使中西部与政治文化中心共同享有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，共同面对美好前景。通过《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》，我们与开拓者一路同行，走进中西部，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、分担他们的艰难困苦。感受文明、传承文明。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，不会因岁月流逝、天灾人祸，而零落泯灭。

《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》是20世纪结束后，重返这一历史时期的高速路、立交桥。

八十年前的西北全景图

董炳月

本书的两位著者顾执中和陆诒，均为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。

顾执中（1898-1995）生于南汇县周浦镇，中学时期即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，1919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东吴大学，1923年入上海《时报》社当记者，1927年转任上海《新闻报》社记者，1928年利用业余时间在上海创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，是民国时期办学时间最长的新闻学校，直到1953年才停办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他加入教师救国会和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，1934至1935年间历访欧洲及苏联、美国、日本等地。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40年8月，遭日伪特务狙击负伤。后辗转重庆、印度，继续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和报纸编辑工作，1946年回到上海，续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北京，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，直至1995年以97岁高龄去世。一生从事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工作近60余年，贡献卓著。

陆诒（1911-1997）为上海县鲁汇镇（今上海市闵行区）人，1931年8月20岁的时候进上海《新闻报》画刊编辑室实习。历任上海《新闻报》、《大公报》记者，汉口、重庆《新华日报》记者、编委，上海《联合晚报》、《联合日报》编委、记者，香港国际新闻社主任，香港达德学院新闻专修班主任，香港《光明报》主编。1932年“一二·八”淞沪抗战爆发后，不顾生命危险，采写十九路军英勇抗

战的报道，鼓舞国人斗志。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，他前往承德前线采访，发表了《热河失陷目击记》等通讯。抗日战争时期他走遍中国主要战场，访问过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人，采访过蔡廷锴、冯玉祥、张自忠等抗日爱国将领，及时报道中国反击侵略者的消息，为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上海《新闻日报》副总编辑、中国新闻社理事、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等要职，且曾多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市政协常委、民盟中央委员等职，1997年以86岁高龄去世。

顾执中与陆诒二人年龄相差14岁，但是，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，合作完成了这部重要的《到青海去》。促成此事的契机，就像从上面简单的生平简历中能够看到的，是当时二人在上海《新闻报》的同事关系。当时他们都是上海《新闻报》的记者。1933年7月3日下午，顾执中、陆诒、舒永康、汪扬等人组成的青海考察团从上海北站乘火车出发，当晚到达南京。次日，住在南京的另一位团员黄伯遼加入进来，全部成员聚齐。7月5日，考察团离开南京北上，开始了前往青海的西部考察之旅。一行经徐州、郑州、潼关、西安向西北行进，7月23日到达兰州。7月27日继续前行，8月2日到达西宁。在青海各地进行了十天的考察之后，12日离开西宁返回兰州，踏上归途。一行回到上海是在8月22日，整个考察活动用了大概一个半月。顾执中与陆诒在考察途中撰写了49篇通讯报道，这些通讯报道先是在《新闻报》上连载，后编成《到青海去》一书，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。

顾执中等人在1933年组织青海考察团考察西北并非偶然，而是与当时的世界局势、中国命运密切相关。要言之，这是当时中国人国家意识更加自觉的结果。他们是在1931年日本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

变侵占东北、1933初华北沦陷于日寇之手、中国国土大片丧失的情况下，开始从西北着手展开救国行动。关于这一点，本书所收的第一篇通讯《“不要再一块儿死在东南”》有明显的交代，曰：“处于严重的现时代的我们，已不暇为目前的国难，作无益的呻吟和悲叹；我们只有紧紧的把握住现在，对于已失的领土，我们当以铁血去收回，对于尚未失去而已经危机四伏的边疆，尤其是广大富饶的西北，当奋全力以经营它，充实它，以免重蹈覆辙。”因此他们结成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，并决定“从青海着手做起，在工作之前，先组织考察团实地去考察，以作将来做边疆文化工作的张本，同时以考察所得，报告国人，以唤起国人对边疆的注意。”本书最后一章是《青海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》，指出：“在地理上，青海的地位，界乎赤白两帝国主义之间，假如一旦突然有不幸事件发生，其影响所及，决不单是当地某某军人或某某民族问题，而是整个的国家和整个的民族问题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全国民众，尤其是青年们，不要再像以前东北一般让狰狞的外国人来代我们注意她，我们自己应当一起来维护她，痛惜她，不要让这块好好的河山，不闻不问的任其长在黑暗势力的统治之下，过惨苦的生活！”这种结论是本书的出发点逻辑性地导致的。首篇与末篇的这种对应关系，表明本书对青海的叙述是在唤起国人、救亡图存的框架之中进行的。

上述忧患意识并非仅仅为考察团独有，而是为本书的关联人士共有。孙科（1891-1973）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不仅表达了同样的忧患意识，并且在更大的背景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阐发，将蒙古、西藏问题纳入进来。曰：“夫外蒙我之北屏也，执国人以蒙事问之，吾知其必不如俄人习之之深也；西藏我之南障也，执国人以藏事问之，吾知

其必不如英人探之之详也。坐是外蒙遂被胁于俄，西藏遂受制于英。今则关东、热河，且沦于日矣，亦由日人覬觐久，而驰骋熟，故遂一入而不可御也。然则吾国虽以地大物博豪于世，使不急谋固圉补牢之术，则边疆诸地，其不为关东、热河之续者几何！”因为同样的原因，青海考察团的工作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，受到了多方面的关心。这从《青海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》结尾处致谢的对象可以看出。资助、配合这次考察的有各级政府的行政官员，有经济界人士，有新闻出版界人士。

显然是因为有这种进行爱国宣传的自觉性，因此著者为了扩大考察活动的影响，充分发挥了新闻、出版等现代媒体的传播功能，并且努力借助国家行政权力。将通讯报道在上海发行的《新闻报》上连载，连载结束之后又由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，无疑是为了扩大传播范围。第一篇通讯用张继的话做标题，单行本出版的时候请孙科写序，则是力图通过引入国家行政权力、发挥名人效应来扩大影响。张继（1882-1947）早年先后留学日本、法国，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，为民国元老，1921年即曾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。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，后历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、北平政治分会主席、国民党三大至六大中央监委委员、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国史馆馆长等要职。考察团出发不久的7月8日上午，在徐州开往郑州的火车上与张继相遇，“中委张继先生”这一称谓中的“中委”头衔，应当是指张继的“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”职位。孙科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曾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，1932年底任立法院长与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。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为《到青海去》写序，无意会大大地扩大《到青海

去》的社会影响。

《到青海去》内容十分丰富，可以说是1933年中国西北地区的百科全书。从所涉地域来看，考察团虽然是以青海为目标，但沿途是经过陕西、甘肃等西北省份，著者对这些地区进行了详细的考察、记录。因此，《到青海去》展示的实际是陕、甘、青三省的社会全景图。从内容看，著者是对相关地区的状况进行全面考察，包括自然状况、行政机构、民族构成、宗教状况、教育状况、人口、矿产等等。关于这些，读者只要看看各章中的节题和表格即可明白，无须赘述。这里要强调的是，由于著者具有救亡图存的现实目的性，因此十分关注各地的社会现实状况。但与此同时，著者也有自觉的文化意识。组织“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”，即表明了这种意识的鲜明。因此，本书在具有现实关怀的同时，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、相当的文化深度。该书的文化内容大致可以区分为三方面。一是由于相关地区为多民族聚居区，汉、回、蒙、藏等各民族的生存状况、宗教信仰不同，因此该书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载。这方面《金碧辉煌的塔尔寺》、《民和县之复杂种族》、《活佛在番土两族中之权威》诸章具有代表性。二是对各地风俗、生活方式的记录。这方面《用牛粪擦碗的番民生活》、《女权制的番民风俗》、《男女相率结队觅合》诸章比较有代表性。此类内容与宗教、民族问题有关联，但又是超越了宗教与民族。三是文学性的内容。该书对各地社会图景的记叙具有文学色彩，并且记录了一些民歌，涉及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学，有采风的元素。本书中记录民歌的篇目不止一章，仅《化隆县之八宝山》一章，即记录表达男女相悦之情的民歌六首。

青海考察团进行西北考察，相关通讯报道的发表、《到青海去》

的出版，都已经是将近80年前的事。但是，重新出版《到青海去》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进入21世纪，中国正在进行西部大开发，而本书告诉我们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已经不仅具有自觉的西部开发主张，并且进行了脚踏实地的工作。近80年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胜利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、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，国内、国外局势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书中的某些问题已经解决，但是，书中对西北地区历史的叙述、对资源的调查，对于今天的西部开发依然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。更重要的是，该书的记述是作为现代中国的“历史记忆”存在的，在此意义上它价值永恒。作为社会、历史、思想、文化的研究资料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现代中国乃至重新认识现代中国。众所周知，男女平等、思想解放、恋爱自由等等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理想，但是，从前述《到青海去》所涉西北地区的民俗、生活方式来看，男女平等、思想解放、恋爱自由等等好象从来都没有成为问题。由此可以知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多元性，可以知道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、都市与乡村、知识界与民间的差异或分裂。这方面的研究，需要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来进行。

最后对校订工作的相关问题略做说明。

该书出版于1934年，当时使用的是繁体字，新版改为简体字。但是，考虑到该书不仅是一个历史文本、社会文本、文化文本，同时也是一个语言文本，因此新版尽量保留原版的语言面貌，对于现在人们已经不太习惯的表达方式，对于“那末”（同“那么”）、“米突”（同“米”）、“移住”（迁居）、“专门家”（专家）、“時計”（手表）、“记念”（同“纪念”）等今天不用而当时常用的词汇，

均未做修改。

不过，由于该书为二人合著、篇幅较大，而且初版本的编排和校对有未尽完善之处，因此，为了便于现在的读者阅读，整本书进行了全面校订。校订之处未一一注明，仅将校订规则说明于此：

一，原著目录未编号，新版对目录进行了编号，并将序言置入目录中。目录中的题目与正文中的题目文字有差异者，以正文为准进行了统一。

二，改正了个别明显的错别字，重新标点了影响文脉节奏、影响读者阅读的句子。原著在行文中应当使用句号的地方大量使用了逗号，影响文章层次的划分进而影响了阅读，因此校订者将许多句号调整为逗号。

三，原文为竖排本，叙述中举例或说明时多用“如左”一词。新版为横排本，故“如左”一律改为“如下”。

四，外国人名按照现在的译法进行了统一。如“莫索利尼”改为“墨索里尼”。国内地名保留原貌。如“邠县”，因“邠”改为同音异体字“彬”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，故保留原貌。

五，原著数据内容只是用分行、分段的形式排列，新版改为列表呈现。

本次整理《到青海去》所用的版本，是中华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九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版本。

孙序

青海河源之地，禹贡称导河积石，西戎即叙；盖在唐虞之世，已为华夏声教之所暨。三代以还，有国者弗能经远，遂为羌浑吐蕃所迭据。考之于史：汉之赵充国张奂段颖，唐之哥舒翰，宋之王韶，虽尝征抚之而不能有其地；元之章古，虽尝镇其地，而不能附其民；明代授诸番僧，以禅师国师之号，优其赏赉，亦仅能使边患稍息，而不能变其政；其后蒙古南侵，与番逼处，清雍正时，既平其乱，乃置办事大臣于西宁，蒙人以旗制辖之，番人以土司辖之，此似有其地，附其民，而变其政矣，犹不能易其俗，而革其心，不过每岁会盟于海滨，聊示羁縻而已。讫于今日，国人渐知其土旷人稀，畜蕃草美，宝藏韞而待掘，山阜童而待植，始议改为行省，移民以实之；顾仍以阻远为惮，虽竞言开发，而能身践其境，从事考察，以引起向往之同情者，尚寥寥也。夫外蒙我之北屏也，执国人以蒙事问之，吾知其必不如俄人习之之深也；西藏我之南障也，执国人以藏事问之，吾知其必不如英人探之之详也。坐是外蒙遂被胁于俄，西藏遂受制于英。今则关东热河，且沦于日矣，亦由日人覬觐久，而驰骋熟，故遂一入而不可御耳。然则吾国虽以地大物博豪于世，使不急谋固圉补牢之术，则边疆诸地，其不为关东热河之续者几何！青海自内部准望，虽若偏于西北，合全部之幅员视之，实居国之中央；诚使青海向治，则控驭蒙藏，殆可收指臂之效。顾君执中，有见于此，因于今夏组织青海考察团，陵暑犯险，历千辛百苦以赴之，举凡目之所触，耳之所闻，心之所感，一一笔之于册，非惟青海之民风土宜，经济宗教，昭然若镜，

即途次所经，如陕西甘肃之农田水利教育交通，亦间及焉。吾愿读是编者，勿徒以寻常游记观之，斯则顾君之志也！

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孙科

钱 序

在昔司空掌土，务拓殖俾阜黎民，而礼运“货恶弃地”之言，三复致意；于以见先哲所以发展民生，诱导地利者至周！近顷士夫懔于内忧外患，亦复盛唱其启发边徼之论；顾辄囁囁然，张政策于笔舌之中，坐而言，弗能起而行。安得俊才实践之士，投袂先驱，资为倡率，作吾党光乎？客岁之夏，顾君执中应陇海所组陕西实业考察团之聘，既与当时贤士夫西行周咨，致力探讨，今春又贾其余勇，并深入遐方，参与青海之考察。兹偕同志壮游既竣，爰本故实，著之篇帙，都廿万言，欲以公世，乃承问序及余。余维青海为吾国西陲重镇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饶，只以交通梗阻，遂至几与世隔，事实上等诸荒服化外；以视欧人冒险拓地，披治榛莽，远至冰荒穷岛以殖民者，相去何啻霄壤！而顾君高瞻远瞩，独不惮山川跋涉，攘臂远征，足迹所至，以述以考，剴劂专编，用飨邦士。凡兹勇气与苦心孤诣，不亦鉴于国际民族之激荡而特为开发边徼之先锋乎！行见是书出版，足以发挥西北精神，所关于政治地理者至大且要。岂第洛阳纸贵已耶！抑吾尤所枵触者，即中国边患已臻极度，数十年来，满、蒙、回、藏频起交涉。惟青海独晏然无事，等于世外桃源，亦幸事也，第其地介于回藏，能否长此安堵；不生故障，而弗为帝国主义者目光所注，正复难凭？先民有言，“尔有钟鼓，不攻不考，宛其死矣。惟他人是保，”傥我而不自开发青海也，则耿耿者自有人在。前车可鉴，来轸方道，顾君斯著，殆亦怵于此义，而发国人之深省也欤？

二十二年冬月杭县钱宗泽

李 序

同社顾执中陆诒两君，远游青海，共述所见闻，刊之报章，篇帙既积，勒为专书，属余为弁一言。两君所纪文字之条鬯，疏状之真挚，与夫山川道里之阻，行旅途涉之危，僻壤民俗之陋，萑苻四野之险，夙已为读者所知，无待费词；今所欲言者，惟就此书之质性一评鹭耳。读此书者，或将以为新体裁之游记；余则以为两君此行，发愿于谋展边疆教育，非漫游者比。故就此书质性言，实向来所未有者也；其或有之，亦磨灭不传者也；其或有传者，亦仅单文短节，托于寓言，附于鉅帙之中，不为人所注视者也。何以言之，安土重迁，为吾民族特性，尤不欲涉艰险，如西人之驰想遐荒，非有所迫，无肯投身塞外者！自来笔记，述远陬风土者，如范石湖之《骊鸾录》，则使节所令，不容辞谢者也；如王述庵纪川滇金川之事，则微官被命，万里从征者也；如洪稚存之《天山客话》，则迁客远戍，聊慰牢愁者也；如徐霞客志在探奇，足迹遍天下，已称难能可贵，然亦仅留连风景，扩见闻，以资谈助，非有拓边化民之志；如晁错议移民实边，赵充国议屯田，所志者远大矣，然仅琅琅一疏，未能裒然成帙；故曰此书向来所未有也！唐之宰相贾耽，志在四裔，著述不尠，然惟唐书本传，存其目录，所述若何，则只字未睹；改曰其或有之，亦磨灭不传也！吴敬梓著《儒林外史》，述青枫城被学劝农，颇与顾陆两君之志相近，但仅全书中之一则，且纯为幻想；故曰其或有传者，亦仅单文短节，托于寓言，附于鉅帙之中，不为人所注视也。然则此书之真价，不可见欤！抑更有所感者，顾陆两君，非有所命，非有所迫，溘